本版编辑：李少军
E-mail：t6@studytimes.cn
Tel：010—62806049

板凳宁坐十年冷 史海无涯乐作舟

——记历史学家金冲及

□ 王建柱

金冲及治史近70年，对百年中国每个脚印，如数家珍……对已经86岁的金冲及来说，似乎不适合再用“成长”二字。他74岁卸下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等职务后，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向了学术研究领域。有些人推测《20世纪中国史纲》是他的封笔之作，他却果断回应：“我不说‘封笔’。”那些或新或旧、如山如海的史料，已经被他视为精神食粮，不“吃”不行。采撷、咀嚼、反刍、回味这些精神食粮，会有新的体悟、新的发现。“我想，到了我这样的年纪，虽然再做长期的、很大的计划已不太现实了，但的确还可以再做一些事情。”对这样一位精力充沛、从茫茫书海中不断发现“新大陆”的老者，怎么不适用“成长”二字呢？

历史学者——既是无悔选择，也是时代赋予的身份

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，金冲及就被认为是史学界的翘楚。60多年来，金冲及著述等身，新作新论不断，一篇篇见解独到的论文，一部部功底扎实的专著，奠定了他在中国史学界，尤其是中国近代史学界牢固的学术地位。

金冲及上小学时有一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“历史小丛书”，每一本就是一个历史故事，他看得入迷。有的书名他至今都能说得上来……

后来考入复旦中学。那时候，由武汉大学教授李剑农编著的《最近三十年中国政治史》颇为流行。十几岁的金冲及用积攒的零用钱买来，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。直到今天他还纳闷：“小孩子读这样的书居然不觉得沉重。”

对历史的日渐痴迷让16岁的他在高考填志愿时决心选择历史专业。他最终选择了复旦大学史地系。

1951年金冲及大学毕业留校工作。先后担任校团委书记等职务。那时，学校鼓励有条件的党政干部在系里兼课，“双肩挑”。于是，从1953年起，金冲及走上讲台，讲授中国近代史。先是给新闻系讲，以后给历史系讲，一讲就是十几年。

从1965年到2004年间，他先后在文化部、文物出版社、中央文献研究室等部门工作……看似都和历史有关系，其实用他本人的话讲——“我改行改大了”。

1983年，一纸调令将他调往中央文献研究室。多如牛毛的档案任他查阅，53岁的他仿佛找回了中学时一头扎进图书馆书库的那种感觉。他如饥似渴，开始了对党史的研究。

“改行”带来的广泛涉猎令他眼界开阔，思维活跃。他的作品（主编、撰写、合编、合著或参与编写、制作）可以印证这一点：不光有《辛亥革命史稿》《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》《转折年代：中国的1947年》等严格意义上的史学专著，还有《毛泽东传》《周恩来传》《刘少奇传》《朱德传》《陈云传》等人物传记，甚至，我们还能在《周恩来》《长征》《延安颂》等影视剧的字幕单上看到“总顾问：金冲及”的字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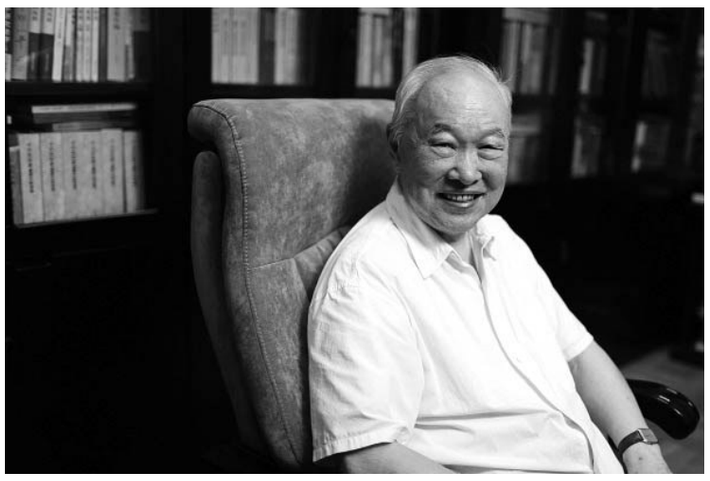
严格的史学训练、厚实的史学功底和深远的史学眼光使他善于思考、敢于碰硬。75岁生日的第二天，他把稿纸铺在写字台上，落下了《20世纪中国史纲》的第一个字。自此寒来暑往三载有余，一部100多万字的史学巨著终于出手了。

板凳宁坐十年冷——“挤时间读书是我几十年养成的习惯”

“板凳宁坐十年冷，文章不写半句空。”这是历史学家范文澜的名言，也是金冲及治学的座右铭。了解金冲及的人都知道，他做学问，80%的时间在看资料，20%的时间写作。他1981年开始做党的文献研究工作，到1988年才敢发表个人署名的第一篇有关党史的论文。对著作同样是如此。他说：“当主编决不能仅仅挂个名，而是对全书的每一个字都得负责。”

17岁上大学，20多岁出书，在别人看来是聪慧过人，但金冲及却认为自己“很笨”。他至今都不会使用电脑，一切皆靠手抄，他书桌上那写满蝇头小字的手稿，都是一字一句手写下来的。一部《20世纪中国史纲》就是这样一个个字写成的，连整段的史料也是一笔笔恭录。正是这种硬功夫，让历史的每个细节都在金冲及的脑海里留下深刻印记，最终了然于胸、把握娴熟。

阅读大量史料，并不见得就能在历史长河中发现问题，提出见解，阐释新意。金冲及认为，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、充分占有史料之外，“视野一定要广阔”，要拥有“跑野马”式的博览兴趣。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积累广泛的知识。1972年，金冲及调任文物出版社，先后任副总编辑和总编辑，一干就是10多年。10多年间，他系统地补充了考古、青铜器、陶瓷、古建筑、书画等方面的知识，至今对历代瓷窑的特点还能脱口而出。文物考古出版的工作经历和学习，拓展了金冲及的研究视野。



每天上班下班，还要参加各种会议，但无论多忙，金冲及也要保证一段独自阅读的时间。“挤时间读书是我几十年养成的习惯。”时间从哪里来？金冲及有一套节约时间窍门：一是不串门，二是不看电影。他的朋友虽多，但大家聚会很少，好朋友一年见一次面就差不多了，见面谈的也大多是学术问题。有限的时间怎么用？金冲及说：“要经常掂量和盘算，不能走到哪里算哪里，要不断总结，提高工作效率。用心和不用心，结果大不一样。”

正因为时间紧，才格外珍惜，分秒必争。金冲及有个在理发时看书的习惯，一边理发一边捧读，理发师傅对他总是牢骚不断；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，地震次日，他就在暴雨中头顶塑料布，埋头阅读汤用彤的《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》。

在他看来，研究历史没有捷径。有的人不愿意研究那些看似乏味枯燥的史料，却先提出一个看似标新立异的理论，没有史料支撑的理论是空洞的，这样的人也可能走不远。倒不如沉下心来，在对浩繁史料的研究中，努力弄清事实是怎么回事，从事实中形成观点，这样的观点才站得住脚。由于“基本功”扎实而厚积薄发，他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在他60岁之后完成的。

少年好读书、读好书——“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”

金冲及自少年起就喜好读书，尤其爱读那些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论著。生活书店的门市是他最爱去的地方，在一个僻静的角落，他能读上一整天。“眼看着国家和社会的状况一天天坏下去，我急需找到解决的办法。当时中外各种思潮的书籍我都涉猎，其中最喜欢邹韬奋的。他不仅讲道理，还与中国现实联系起来。以后又读到艾思奇、薛暮桥、许涤新、胡绳、华岗等马克思主义学者的著述，懂得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。普列汉诺夫的《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》让我对唯物史观的诞生是人类历史观的一场革命有了深刻理解。当《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》《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》等油印本悄悄流传时，我被深深打动，文中对中国社会的透彻分析，让我豁然开朗。经过反复比较，我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。”

1948年初，金冲及加入中共上海地下党后，立即投入到学运大潮中。这既让他接受了革命的洗礼，也遭到通缉。根据党组织指示，他躲避起来，在一间小屋一住就是几个月。充裕的时间让他从早到晚手不释卷，“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我头脑中从此扎根……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金冲及完成了在复旦大学的历史学业，马克思主义理论更成为他研读和写作的指南。他回忆与数学家谷超豪住在同一宿舍的那段日子时说：“虽然研究领域不同，但我们经常切磋读书心得，都将方法看得至关重要。我们认为掌握了方法便可以点石成金，比研读结论更能启发心智。”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，在金冲及看来，“并不是要背诵，更不是要拘泥于他们针对当时情况所作出的某些具体结论，而是要透过他们的论述来学习他们观察分析问题的立场、观点、方法，提高自己理论思维的能力”。从1955年在《历史研究》上发表第一篇文章《关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》起，一直到2009年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》出版，再到辛亥革命百年、毛泽东诞生120周年时撰写的一系列文字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光辉始终照耀着金冲及的学术生涯。几乎每隔一段时间，金冲及都要著文论述自己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心得。当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时，作为咨询委员会委员，金冲及全身心投入其中，花费了大量心血。

使命与责任——“这是党交给我的工作，没什么苦不苦的”

金冲及是一位学者，一位朝夕与学问为伴的人。从1953年到2004年74岁离休，担任各种领导职务长达53年。他说：自己的“头衔不少，不过，我的本职就是一名史学工作者”。他认为，这是一种社会责任。“这是党交给我们的工作，没什么苦不苦的。一件件文献并不仅仅是一张张纸和文字，透过它看到的其实是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和时代画面，就像电影胶片，如果分开看，每张都是死的，但通上电一动，就在你眼前活起来了。读文献时，这股电力就是人的理解力。”没有时间看电影的金冲及却很喜欢用电影来打比方，很诚恳，也很有感染力。

金冲及的研究兴趣是近代历史，且是辛亥革命史的专家。年过半百，因为工作之需，将范围扩大到党史，对他而言是个考验。但考验的结果证明，他的治学功夫不仅让他迅速适应了工作，且还在新的领域取得丰硕成果。70岁以后，他写下了《转折年代：中国的1947年》；75岁生日的第二天，20世纪的中国历史全景，又在金冲及的笔下奔涌而出：《20世纪中国史纲》共四卷，皇皇巨作，120多万字。2009年出版后，一年内发行8万多套，在史学界引起轰动。

名家治学

读书与文化软实力

□ 葛荣晋

书而思

现代人既需要财富和健康的硬势力，更需要知识、道德和信仰的软势力。读书不仅可以提高现代人的文化知识水平，达到健康长寿目的，而且也可以提高现代人的道德修养水平，从而构建人的道德境界，坚定人的信仰和梦想，启发人的哲学智慧。这种文化软实力，比健康长寿的硬实力更为重要。这才是每个人综合实力所在。一个不读书的人是没有前途的，一个不读书的民族也是没有前途的。

所以，在读书远离我们的当今社会中，现代人应牢固地树立“终身学习”的理念，努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。早在中国春秋末年，著名教育家孔子就是“终身学习”、自学成才的典范。他敏而好学、不耻下问，一生都在努力读书，追求知识。他曾说过：“学而不已，阖棺乃止。”在《韩诗外传》中有这样一则记载：“孔子燕居。子贡摄齐而前曰：‘弟子事夫子有年矣，才竭而智罢，振于学问，不能复进，请一休焉’。孔子曰：‘学而不已，阖棺乃止’。这段话的意思是：孔子在家里休息，他的学生子贡就提着长袍下襟去见他，说：“我跟你学习好几年了，可是现在感到才能枯竭，智力疲惫，看来学问是停止不前，不会再有什么进步了。还是让我把学习停止一下吧。”孔子答曰：“学习是不能停止的，一个人应该是到了盖棺材的时候才能停止自己的学习。”孔子深刻地阐明了“活到老学到老”的“终身学习”理念。孔子还说：“加我数年，五十以学《易》，可以无大过矣。”他将读书学习视为人生的第一要义和终身目标。

在现代中国社会中，革命先行者孙中山说：“我一生的嗜好，除了革命之外，就是读书。我一天不读书，就不能够生存。”毛泽东同志也是“终身学习”的典范。他说：“我一生最大的爱好是读书。”“饭可以一日不吃，觉可以一日不睡，书不可以一日不读。”他从四五岁读蒙书开始，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治国理政时期，真正做到了“枕上、厕上、马上”手不释卷，嗜书如命。甚至在他弥留之际，还叫别人为他念书，直到逝世，整整读了一辈子的书。

宋代诗人翁森有两句诗：“踯躅莫遣韶光老，人生唯有读书好。”希望大家千万不要为世俗应酬所役，白白地浪费时光，让宝贵时间逝去。我们当少一点应酬，多一点读书。不管你有多忙，每天都要抽空读书。在构建自己的物质境界、健康长寿境界的同时，更要在读书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，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。

“读书与人生境界”之四

用典释义

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本。

【讲话原文】

“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本。”中捷双方应该适时提高双边关系定位，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双边关系，本着互相尊重、平等相待的原则，坚定支持对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，确保中捷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，牢牢把握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。

——习近平《奏响中捷关系的时代强音》（2016年3月26日）

【出处】

臣闻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远者，必浚其泉源；思国之安者，必积其德义。源不深而望流之远，根不固而求木之长，德不厚而望国之治，虽在下愚，知其不可，而况于明哲乎？

——（唐）魏征《谏太宗十思疏》

【解读】

《谏太宗十思疏》是魏征于贞观十一年（637年）写给唐太宗的奏章，意在劝谏太宗居安思危，戒奢以俭，积聚德义。“十思”是奏章的主要内容，即十条值得深思的情况。“疏”即奏疏，是古代臣下向君主议事进言的一种文体。魏征因直言进谏，辅佐唐太宗共同创建“贞观之治”大业，被后世赞为“一代名相”。魏征去世后，唐太宗亲自为他撰写碑文，并对侍臣说：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”将魏征比作“人镜”。

奏疏的首句即为：“求木之长者，必固其根本；欲流之远者，必浚其泉源。”长，生长。本，树根。意思是说，要想树木生长得高大茂盛，一定要稳固它的根系；要想水流长远，一定要疏通它的源泉。这是采用比兴手法，以引出所要陈述的观点：“思国之安者，必积其德义”，想要国家长治久安，人君一定要积聚道德仁义。

习近平主席在文章和讲话中，多次引用魏征的这句名言，旨在强调基础工作的重要性。无论是国家双边关系，还是地区安全合作，抑或是思想政治工作，都要固本强基，这样才能行稳致远。

（杨立新）

书海泛舟

成就强秦的变革之道

□ 纪林繁

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商鞅已渐去渐远。但是，我们依然可以通过商鞅的著述——《商君书》，管窥商鞅改革、治理的基本思想，这些思想体现了秦国的变革之道。

因时而变

商鞅指出了因时而易、各当时而立法的主张。时代环境的变化导致了社会形势的差异，因此治国手段不可偏执一端，要因时而变。他认为上古的圣贤治国方法不一，而天下皆称王，以古论今说明“三代不同礼而王，五霸不同法而霸”，“治世不一道，便国不法古”的道理，驳斥了旧贵族“循礼”“法古”的主张，为变法革新提供了理论基础。

任法而治

商鞅主张任法而治。商鞅对人性不怀好感，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，以此为基础提出了他的“法治”思想。在商鞅眼里，法治至少有以下三个方面的功效。

第一，提防人性之贪婪，起到定分止争的作用。“一兔跑，百人逐之，非一兔可以分以为百，由名分之未定也。夫卖兔者满市，而盗不敢取，名分已定也”，商鞅认为，法令不明是名分不定的诱因，而名分不定又会导致“尧舜犹将皆折而奸”的恶果，是势乱之道，并由此得出了法令是民之命、治之本的道理。

第二，消除贵族特权，达到壹赏罚的效果。法治的精神中包含着平等的理念，既然要任法而治就必须破除“刑不上大夫”的教条，于是，商鞅提出刑无等级，“自卿相、将军以至于大夫、庶人，有不从王令、犯国禁、乱上制者，罪死不赦。有功于前，有败于后，不为损刑。有善于前，有过于后，不为亏法”，这在当时等级森严的历史背景下是难能可贵的。事实上，商鞅对于法令的执行并不只针对百姓，在变法中，他表达了“法之不行，自上犯之”的感慨，并严格要求贵族阶层恪守法治，以极大的政治勇气以墨劓之刑处罚了违抗法令、破坏变法的太傅公子虔与公孙贾。正因为用刑平等，才使法律受到尊重，变法得以推行。

第三，严刑峻法使民惊愕，从而实现以刑去刑的目的。商鞅奉行人性恶的观点，认为人是自私自利的个体，因此他不屑于以人类优雅的同情心为视角去探讨社会治理，如果人类真的多愁善感，那么这个社会又怎会有贫富之别和仇恨屠戮呢？商鞅深刻地认识到治国者不可有妇人之仁，流行于人们之中的那些仁义道德只不过是些虚伪的表示，是不可靠的。治国必须“慎法”，法令严酷则人民望而却步，不敢违反，因此便不会有刑戮之灾；相反，法令轻微，则人人敢铤而走险、以身试法，积小成大则会有灭顶之灾。所以商鞅主张“重其轻者”，认为“以刑去刑，刑去事成”，这反而是对人民最好的仁慈。当然，商鞅的法治思想具有显著的目的论色彩，他之所以建议孝公实行法治，主要的原因在于法治有益于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，而非增进百姓福祉，因此，就其实质精神而言，与现代性语境下的法治有不小的差别。

奖励耕战

在富国强兵的目的论导向下，商鞅主张奖励耕战，抑制学商。“国之所兴者，农战也”，“国待农战而安，主待农战而尊”，商鞅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基命脉，也是一国对外兼并、行王霸之事的必要保障，因为农业生产不仅可以为国家积累雄厚的物质财富，而且可以用土地束缚百姓流动，增加壮丁，“民农则朴”，又易于驱使。而所谓的学问、商贸等奇淫技巧乃是巧言虚道的劳民之举，所以《商君书》中说：“劳民者，其国必无力，无力者，其国必削。”商鞅在上书秦孝公时曾把“乐学”“事商贾”而不进行农业生产的人比作“虱子”，认为这些人对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，要严格控制，堵住他们加官晋爵的途径，从而遏制浮华空谈之风，使人民安于农业生产，不生非分之想。在军事思想上，商鞅以赏罚为手段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，他把战功作为世人获得奖赏的唯一条件，无军功不得晋爵，达到“民之见战也，如饿狼之见肉”的效果。在微观层面，他也有具体的作战方法和防御手段，足以见其对于军事的重视。

统一意志

在《商君书》的行文中，商鞅曾多次提到“壹”，即专一、统一之意。商鞅主张，君主要有绝对的权力，使“民壹意”，统一人民的意志，使他们专注于农战，心无旁骛。他提出了“壹言”和“壹教”的观点，主张限制言论自由，以法为教，以吏为师，从而统一思想认识，抑制文人墨客和巨贾商旅所带来的浮夸之风。商鞅认为“上壹而民平”，强调法令必须贯彻统一，不因身份而异法，主张“壹刑”，不改法家思想之本色。正如《商君书》中所说的那样：“圣王之至，慎法、察务，归心于壹而已矣”，“作壹，则民不偷营。民不偷营，则多力。多力，则国强”。在诸侯并起，兼并日盛的战国时代，商鞅的这种集权主义思想具有进步意义，它有效地抑制了国内奢靡浮夸的社会风气，积累了雄厚的物质财富，集中全部国力于对外战争，为后来的秦统一六国奠定了基础。



商鞅

事实表明，在商鞅思想的指导下，秦国厉行变法改制，“行之十年，秦民大悦，道不拾遗，山无盗贼，家给人足。民勇于公战，怯于私斗，乡邑大治”，这不仅推动了宗法分封制向中央集权制转型，而且使偏居一隅的秦国一跃跻身战国七雄，为后来秦统一大业奠定了基础，对后世的治国思想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。所以后人论道：“百年犹得秦政法。”